



中国中青年
教育学者自选集



大学的文化精神 与使命

张应强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
石中英 主编

大学的文化精神与使命

DAXUE DE WENHUA JINGSHEN YU SHIMING

张应强 著

《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编委会名单

主 编 石中英

副主编 唐玉光 程斯辉 司晓宏 王本陆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文化精神与使命/张应强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6

(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 第二辑/石中英主编)

ISBN 978-7-5336-4979-1

I. 大… II. 张… III. ①G521-53②G451.2-53 IV.
G521-53 G45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4468 号

策划编辑: 殷振群

责任编辑: 张 利

技术编辑: 王 琳

装帧设计: 袁 泉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 编: 230601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市美格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7

字 数: 380 000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54.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 3683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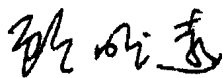
总 序

当《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第一辑十本专著放到我面前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兴奋不已。回想1979年中国教育学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全国从事教育理论工作研究的只有四百多人。为了繁荣教育科学,当时我们呼吁恢复中央教科所、建立中国教育学会,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批准。今天中国教育学会的会员已经发展到八十多万人,全国博士授权点已有几十个,一批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已经成为教育科研的骨干。《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就是他们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成果。怎不令人兴奋!

我与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是有感情的。回想18年以前,1989年他们在大连召开第一次会议,要求成立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究会。众所周知,那时的形势,有些同志有点害怕。但是中国教育学会的老会长张承先同志还是比较开放、很有远见的,认为应该支持中青年这种合理的要求,中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教育科学的繁荣要靠他们。学会就让我来联系这项工作。我也认为,中青年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过去开会,总是老专家占据了讲坛,没有中青年学者讲话的机会。中青年理论工作研究会的成立给中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讲坛。在研究会成立之前,做了几年准备,每年都由我主持年会,以中青年理论

工作者为主,也请一些老专家参加,互相讨论,相互学习,效果很好。1993年正式成立了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我完成了历史使命,就由他们自己组织了,我虽很少参加他们的会议,但一直关心他们专业委员会的工作。看到他们的成长,我的喜悦的心情是难以言状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有了空前的发展,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教育实践呼唤着教育理论的指导。教育科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教育理论还远远不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我们还需要努力,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教育传统,另一方面要吸收外国先进的理论和经验,但重要的是要深入我国的教育实际,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为建设我国的教育理论体系作出了贡献。我祝贺她的出版,并希望有第二辑、第三辑问世。



2007年10月30日

于北京求是书屋

目 录

第一编 现代化与大学的使命

- 001 现代化、价值教育与大学使命
- 012 现代化的忧思与高等教育的使命
- 024 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
- 035 文化转型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
- 051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与留学教育

第二编 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变革

- 061 论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改革
- 074 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
- 081 重视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 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085 海外华文教育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093 华文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彰显

第三编 大学的文化精神

- 102 现代大学精神的批判与重建
- 121 知识分子与大学精神的重建
- 128 大学文化选择论略
- 137 大学校长与大学精神

143 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

155 信息时代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

第四编 现代大学制度

166 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文化取向

178 高等教育创新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186 高等教育公平与高等教育制度创新

197 制度创新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205 体制创新与建设高水平民办大学

214 把大学作为学术组织来建设和管理

221 院校管理中的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

第五编 文化变迁与高等教育发展理念

228 科学发展观与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创新

241 质量与特色: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两大主题

25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政策分析

266 高等教育质量观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277 试论我国高师教育发展模式的转变

285 高等教育改革与我国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第六编 大学发展的文化审视

295 科学发展观和大学发展理念

303 实现大学管理思想的现代转变

310 关于高等学校办学特色的思考

318 多学科视野中的高校特色化理论分析

326 发展战略规划的高校特色

332 科学规划 强化实施 建设高水平综合大学

337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教学质量保障问题

346 中国地方大学:发展、评价与问题

353 重点理工大学的发展转型与综合化战略

第七编 教育研究的文化视野

361 高等教育研究的文化视野

365 大学文化研究范式的缺失与转换

373 生存论转向与当代教育研究范式变革

383 后现代主义与我国的教育研究

394 “交往的教育过程观”批判

403 教育过程的主客体及其关系新论

414 教育中介论——关于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及其关系的认识

422 后 记

第一编 现代化与大学的使命

现代化、价值教育与大学使命^{*}

一、现代化的价值偏狭与重新定向

当我们极力推进现代化大业之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种现象:现代化在东西方均遭遇到挑战,现代性正经受着审思与批判。正如现代化由西方波及东方一样,现代性批判也正首先发生在西方社会而后向东方社会扩展。现代性遭致批判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化中的价值偏狭与缺失。因此,重新为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为现代性灌注一种时代精神,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作了系统思考。他的思想和学说,揭示了现代性之根源性特征是“合理性”,现代化的基调是“理性化”。但理性化导致了“世界的去魅”过程,使“世界中的不同价值领域处于一种无法协调的冲突情景”。因此,韦伯对现代化持一种悲观和忧虑情绪。现代化的演进,正是按韦伯所忧虑的路向发展的。这便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全面征服,导致现代化的价值偏狭与缺失,与人类的初衷背道而驰。

无论东西方社会,人们对现代化都持一种朴素的进步观念,都对现代化

^{*} 原载《现代大学教育》(原《有色金属高教研究》)2000年第1期。

进行过理想设计,认为现代化会朝着发展进步的方向,把人类带到幸福的彼岸。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成就表面上也证实了这种观念。科学的勃兴,结束了千年黑暗的中世纪,使人从神的压抑中解放出来,感受到精神的自由与愉悦;技术的进步,延长了人的手和脑,使人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人们不再为生计问题忧心忡忡;依据理性原则建立的民主社会体制,规范了个体行为,保证了基本人权;闲暇时间的增多,提供了更多自我实现的可能与机会——西方社会的光荣与梦想,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一实现。现代化的伟大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把现代化看作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使每个国家都卷入到现代化这场浩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之中。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和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惊醒了人类现代化的美梦。

为了不断做大“经济馅饼”,满足贪婪的物质消费欲望,人类向自然开战,向其他物种和生命开战,向自己的同类索取。人类失去了敬畏自然和尊重生命之心,不断地消灭其他物种和生命,正在成为“生命的孤独者”,难以享受到与其他物种和生命共存共乐的欢乐。同时,自大的人类亵渎神灵、失去信仰、放逐崇高,正在成为一个精神无所归依,失去终极关怀的精神流浪者。工具理性价值观使得人类把自然界、他人、他物这些本属于人之内在构成性的东西,看作是外在的对象性存在而加以征服与盘剥。这一切它所看作外在的东西,正在以外在的方式走向人的反面,成为放逐人自身的力量,使人失去自由,遭受报复。所以,走向 21 世纪的人类,一方面享受着高度物质文明带来的福祉,一方面又经受着高度精神文化矛盾的炼狱。

由此,人们开始了现代化的价值追问,开始思考为何人类追求进步自由的现代化理想变成了一场现代性的噩梦。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回答是:理性在现代科学技术的驱赶和诱惑下演化成工具理性,启蒙由此变成蒙蔽,工具理性昂首阔步,价值理性悄然引退,启蒙再一次成为新的神话——科学技术的牺牲品。哈贝马斯认为这是工具理性渗透、僭越到生命世界,是现代人在“技术旨趣”的支配下放弃了“解放旨趣”所致的结果。由此,工具理性批判和价值理性的张扬成为人类拯救现代化大业的选择。

为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是当今现代化理论的课题。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以彻底解构和摧毁现代性为其理论主旨和向度,把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切弊端统统归咎于现代性,认为现代性已无可救药,没有必要去进行现代性建构,也没有必要为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不同的是,哈贝马斯既是现代性的激烈批判者,也是现代性的热情建构者。在他看来,作为现代性核心的理性和主体性的确出了问题,应该予以批判,但彻底否定现代性或理性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计划”,我们完全可以在新理性的支持下重建现代性,以使现代性彻底敞开。他认为,作为现代性核心的理性之所以一再走入歧途,使现代性蒙羞和遮蔽,实质在于理性的分化以及分化的理性在各自领域的专门化,使理性忘记和脱离了自己的诞生地——日常生活世界。因此,必须使理性以完整的形式重返生活世界,向生活世界回归,以建立“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从而为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如果说哈贝马斯的这种现代性建构还只是一种理论建构的话,那么,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便是人类为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的实际尝试。可持续发展战略表面上是针对日见严重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实质上是要在人类现代化观念的深处实现一场“革命”,其主旨是要对为工具理性所主宰的现代化运动进行一种价值引导与约束,使现代化成为“属人”的现代化,使之具有人性内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的现代化观,强调人是“发展的促进者和目的”,“内源发展以人为中心,是提高人类和文化价值的事业”。这正表明人既是现代化的推进者,也是现代化的目的。

二、大学精神的退化与价值教育的失位

现代高等教育是启蒙方案的产物。启蒙方案以建立理性社会为鹄的,但启蒙的遗产实际上是工具理性的胜利。这种工具理性影响到社会与文化生活的每一个向面,包括经济结构、法律、科层行政,甚至艺术。当代的现代

化的大学教育,实际当道的正是这种工具主义的理性观。^① 工具主义理性观对现代大学教育的征服与统治,导致了大学精神的退化和价值教育的失位。

大学是一个古老的“组织”,有其特定的文化精神。西方的中世纪大学作为“学者行会”,是学者们自由追求学术,探讨高深学问,进行精神自由交往的地方。它以“象牙塔”自居,自由沉思人类千百年来遗留下来之精神与文化遗产,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与批判。为了保护这种“学术自由”和“精神的自由交往”,大学谨慎地与社会生活保持着一定距离。中国古代那些著名书院,也是志趣相投、追求学术的学者遁居山林,远离尘世,师生相互切磋,自由探讨学问,追求人生境界的“学者共同体”。大学是自由的、超越的,是远离尘世和功禄,追求真理和至善之境的,是具有文化批判精神的。大学之精神孕育出文人之精神气节。在科学文化取得强势地位后,大学教育在不同国度形成了不同风格。按蔡元培先生的说法是:英国的大学重养成人格,德国的大学专重学问,美国的大学兼及实用。而不容忽视的是,美国大学兼及实用的风格,在二战之后,风靡全球,成为现代大学的典范。各国高等教育无不受其影响。^② 日本教育家永井道雄曾告诫人们要警惕“现代大学的危机”,认为“当大学与企业结合得过于紧密,学术上又过于反映出实用性的时候,大学的创造性就会枯竭”。^③ 就当今大学来看,还不只是创造性枯竭问题,大学的自由与批判精神,大学中“精神的自由交往”已不复存在了。大学成了人力工厂,成了职业培训所,成了现代人追逐名利的竞技场,成了人们各取所需的百货商店。用尼采的话来说,大学成了“精神本能退化的工场”,“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把人变成机器”,使人失去自我和生命本能,听命于知识,听命于金钱,听命于国家,而独不听命于他自己。^④

① 金耀基. 现代化、全球化与华人教育[A]. 鲁洁. 华人教育: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球展望[C].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8.

② 菲利浦·G·阿特巴赫. 比较高等教育[M]. 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5:34—36.

③ 大光. 永井道雄的高等教育思想[J]. 高教文摘,1991,(5).

④ 刘以恒等. 世纪之交的教育选择[M].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20.

大学精神在现代的退化,与价值教育在大学中的失位有着某种共生关系。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大学教育出现了一种“知性取向”,完整的教育演变为技术教育,价值教育在大学中处于被压制和边缘化的境地,“关乎什么是好的人生、好的社会的伦理教育,则不再是高等教育的中心”。^① 这种状况已具世界性。1987年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对美国大学的教学状况的调查表明:“教育目标上的混乱,是美国大学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招揽学生,同时受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的驱使,许多本科院校丧失了使命感,对其应负的使命认识不清”,“眼光短浅的强调职业教育的主张以其注重技能训练而支配着学校”,“对于那些赋予存在以意义,并帮助学生正确对待生活中重大而超越的问题,他们一直漠然置之”。^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指出:“为了训练的目的,一个人的理智认识方面已经被分割得支离破碎,而其他的方面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忽视……为了科学研究和专门化的需要,对许多青年人原来应该进行的充分而全面的培养被弄得残缺不全。”^③ 这种状况的集中表现,就是大学教育的“实用化”和“外在化”。池田大作和汤因比对现代教育有个基本评价,他们认为现代教育陷入了功利主义,学问成了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失掉了本来应有的主动性,因而也失去了尊严性。由于认为唯有实利的知识和技术才有价值,所以做这种学问的人都成了知识和技术的奴隶。^④ 这种实用和功利化教育所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教育的外在化”。教育之追求“成人”的无限目的,被化解为适应眼前之生存适应的有限目的。教育之内在价值追求,蜕化为外在之实利追求。因而,人性的提升、生存的价值不再是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与之相应,大学教育的内容,便是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和技术。由于价值体系及观念被认为

① 金耀基. 现代化、全球化与华人教育[A]. 鲁洁. 华人教育: 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球展览[C].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8.

② 欧内斯特·博耶. 美国大学教育——现状·经验·问题与对策[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8: 18.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 学会生存[M].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193.

④ 池田大作, 汤因比. 展望二十一世纪[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61.

不是知识,因而被排斥;大学教育的方式便是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那种自我的品行修养、自我对个性的砥砺、自我的实践活动不被看作是教育的方式,因而教育活动被窄化,认为教育活动只是那种“你”对我的活动,而不是我对自我的精神活动。大学教育的方法便是灌输和接受,教育不再是主体自我发动、自我实践的享受性活动,而成为一种外在于主体的负担。人性本有的教育追求成为主体之外的强制。学生在教育中不是感受到自由与幸福,而是感受到受控与痛苦。学校成为现代人试图逃避又不可逃避的“牢笼”。这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所造就的“单向度的教育”和“单向度的人”在现代所遭遇的尴尬。

然而,人性本有之明德和教育本有之精神并没有彻底泯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制,导致价值理性的强烈反弹,实用和功利化的大学教育观正遭受人们的批判,教育的人文诉求在大学中得到张扬,谋求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趋势之一。因此,大学精神的复归和价值教育的复位成为世纪之交大学教育的一种重要转向。在此大背景下,价值教育必须进行重建和提升,以激活现代人的“解放旨趣”。这种价值教育的要点,在于重返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精神家园,重新确立起神圣和超越的至善目标,把臻于自由个性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教育之终极目的。这就是说,教育要把人作为目的和价值归宿,把人自身的解放和人性的完满作为价值追求,使教育由“外在化”走向“内在化”,由外在的技术追求转向内在的价值追求,由外在的实践活动转向为内在的实践活动,由对外在世界的改造转向为内在精神世界的改造,同人的意义世界建立起普遍联系。这也许是杜威所说的“(教育)在它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的深刻意蕴。

三、价值重建中的大学使命

“重建价值观”成为人类在步入新世纪前被迫作出的一种选择。“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大卫·格里芬基于韦伯提出的“世界的去魅”

命题,提出价值重建必须从科学的“返魅”开始,主张要在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之间进行一场新的对话,来建立一种后现代的科学观和宇宙观。要将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重新纳入到自然中来,不仅将各种生命当成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而且当作它们自身的目的。^① 胡塞尔提出了“理性向生活世界回归”的思想,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并用“交互主体论”来建构科学理性和生活世界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人与人交往共存的世界,要用尚未分化的“交往理性”去观照已分化了的科学理性、人文理性,使其重返日常生活世界。这些关于价值重建的宏论,实际上表明了一种价值重建方向或策略,即“在人性架构之内控制科技发展,用神圣的、世界性甚至宇宙性的观点,同时藉由培养社会、道德和精神德性,去平衡物质的进步。”^②这种价值重建策略的根本,在于实现人类价值观的“革命”。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大学教育自然担负着一种特殊的使命。

中国古代即有一种深刻的大学教育观。《学记·大学》开宗明义便指明了大学教育之目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去气稟之局限,革欲望之蔽障,以复现人性本有之光明,追求至善之人生境界,这一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正是教育之真精神。

金耀基先生说:“我们必须检讨由启蒙方案发展以来的知识与教育的典范,必须思考大学教育的定位与定性问题。”^③大学教育之“位”与“性”原本是清楚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即是大学教育之“位”与“性”的最好表达。只是由启蒙方案发展而来之工具理性,以及由此确立的近代知识观与教育观,使大学教育之本位已失,本性已蔽。由此,其“定位”与“定性”方才成为大学发展所必须首先要做的工作。

给大学教育以“定位”与“定性”,首先是要回归大学固有之“本位”,彰明

① 大卫·格里芬. 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 马季方,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44.

② 罗马俱乐部. 第一次全球革命[M].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186.

③ 金耀基. 现代化、全球化与华人教育[A]. 鲁洁. 华人教育: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球展望[C].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0.

教育之真实“本性”。大学之“本位”在社会之学术与文化单元,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是进行文化批判与追求人生至善之境的“圣地”,是通过精神自由交往,提升人性的“精神之都”,而不是人力工厂和知识商店。教育之本性乃是人之追求至善境界,追求自我超越、自我实现,以改造自我精神世界的实践活动方式。马克思曾提出过“外在实践”(practice)和“内在实践”(praxis)的概念,教育实践活动正是那种摒弃了外在目的和强制,由主体自我发动、自由地创造完美人性的“内在实践”活动。大学之“本位”与教育之“本性”,皆可由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来予以观照。当然,这种大学之道,须结合时代精神与时代特征予以重新诠释。

当今的大学实质上面临着内外部的双重困境。从大学教育自身来看,其价值观已为工具理性所主宰,教育已成为实利的下贱侍女;从大学教育外部来看,物质主义和商业文化笼罩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双重困境”使大学担负着双重超越的使命:既要超越自身,将自身从工具理性的役使中解放出来,又要超越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现实文化,行文化批判与革新文化之功能。具体来说,当今时代的大学使命主要有如下三条:一是提升人性,二是教化社会,三是泽被人类。以达到人格之养成,学术之发展,文化之进步的目的。

提升人性是大学教育之使命的核心和根本。康德说:“人只有经过教育才能成为人。”无论是持“性善论”或“性恶论”的人性假说,教育都是使人向善求善的,只不过有“扬善”与“抑恶”之别或“内引”与“外铄”之别。人性的提升,便是“新民”过程。梁启超先生认为“新民”之“新”有二义:一曰淬砺其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本无而新之。人性本有与人性本无,皆需教育“新”之,而教育之“新”民过程,是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过程,绝无终点。尼采说:“成为人即处于成为人的过程之中。”成人的过程不止于成为现实之人,而是成为至善之人。而至善之人,现实并没有给定,也不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而是要在人的自我实践中去展开,去发现,去创造。这也是人的一种本性。正如马克斯·舍勒所指出的:“人从不满足于周围现实,始终渴望打破他的此时——此地——如此存在的界限,不断追求超越环绕他的现

实——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当下自我现实。”^①因此，提升人性的过程是一无止境的过程。如果说有止境的话，那只能是一种至善之境。

当然，提升人性有时代性内涵。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性提升与张扬，是借科学理性抑神性张人性，以解神性对人性的蒙蔽。结果是神性之役虽去，但人性却又为“物性”所役，为科学理性所役。“物性”的漫延和笼罩，使人走向逐物而不返、为“物性”所役而不自知的境地，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之自然法则泛化为人之生活法则，人性沦为兽性。这就是当今时代提升人性所面临的现实。大学教育要提升人性，主要任务或使命便是抑“物性”去“兽性”，以复现人性本有之明德。用高清海先生之“类哲学”思想来解释，就是使人成为具有类意识、类视野的类主体。提升人性便是发展起人的“类”性，而人的类特性，恰恰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教育是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这种自我建构，其实是一种人性建构，这种实践活动，其实是自我改造主观精神世界的内在实践活动。

教化社会是大学使命之外在表现。提升人性扩展至社会域，便是教化社会。“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此为大学教育功能的恰当表述。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当是社会的文化组织，是新思想、新文化的源头活水。其功用当是通过文化创造、文化批判与文化传播来淳化民风，教化社会，导引社会文化进步。因此，中国历史上有“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的说法，“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梅贻琦先生语）。大学教化社会之功自不待言。只是在当今时代，商业文化当阳称尊，大肆的广告宣传和过度的物质消费，将扩张人的欲望与满足人的欲望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相互激励的恶性循环。物质主义的诱惑，也使大学放弃了长远责任，沦为与工厂、商店、行政组织无异的“社会组织”，导致大学之真精神渐晦而不彰，大学教化社会之功渐糜而不显，出现了社会现实文化引导大学的病像。社会文化也因缺少一种文化创造与批判机制而浮躁。这就使

^① 马克斯·舍勒.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M]. 陈泽环, 沈国庆, 译.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9: 43.